

【卷二】

阎真文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卷二】

阎真文集

沧浪之水

人民文学出版社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

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屈原《渔父》

序 篇

1.

父亲的肖像是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的。他已经死了,这个事实真实得虚幻。

那天从山上送葬回到土坯小屋,我就失去了悲痛的感觉。悲痛在极点上持续,就不再是悲痛。那些山民,我平时称作婆姨姑嫂爷舅叔伯的,都在屋子里站着,翻来覆去地说着那几句话:“人死了就活不回来了。”“再说老天爷要收人,毛主席他自己都没办法。”屋子里弥漫着烟雾。秦三爹不停地卷着喇叭筒给身边的人抽。这是我非常熟悉的气息,只有山里未经制作的土烟才是这样浓烈而辛辣。父亲生前经常在煤油灯下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缓慢地卷起一支喇叭筒,凑在灯上点燃,吸完了,又开始卷下一支,一句话不说,就过了一晚。昏黄的煤油灯把山民们的身影映在墙上,看久了就会产生某种幻觉。在那些逝去的夜晚,我在父亲的对面复习功课,越过他的肩看见墙上的身影,一动不动,看着看着就觉得那身影不很真切,像墙上凹进去了一块。那些日子一去不复返,父亲在山中,在永远寂静的黄土深处。

夜深了,人渐渐散去。我在油灯下枯坐一会儿,在门坎上坐下来。今夜的风很大,也很纯,风中裹着一丝丝衰草的气息,这是山里人才能分辨出来的气息。没有月亮,稀疏的星星散落在天幕上,衬出远山朦胧的轮廓。山们这么沉默着,已经有无数世纪,这是山外人很难想象的。我在风中听到了一种声音,很多年来我都听到这种声音,像是召唤,又像是诉说。仰望星空使我想起了很久以前的岁月,时间尽头的岁月,还有那些遥远的地方,被称作天尽头的地方,那里一定有什么存在。可是父亲他死了,死了就活不回来了。我想不通,一个人怎么能这么轻易地死去。可这是真的,真的,这个事实无法拒绝。

我极度疲倦又极度清醒。无法入睡，我想把父亲留下的东西清理一下。几件衣服，几十本医学书，这就是一切。我把搁在横梁上的那口软牛皮箱取了下来，打开箱子我闻到一种陈旧的气息，这是藏在隐秘的时间深处的气息。我端起煤油灯照了照，里面是几本书躺在那里。我在平整箱底时忽然感到中间有一块稍稍凸了出来，把油灯移近了仔细摸索，可以摸到一个明显的边缘。我的心突突地跳起来，一下一下生动可感。我仔细摸索着，那深红色的绒面有一侧是被刀割开了的。我小心地把手伸进去，慢慢地掏了出来，凑到灯下一看，是本很薄的书：《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

书的封面已经变成褐黄，上海北新书局民国二十八年出版，算算已经三十八年了。我轻轻地把书翻开，第一页是孔子像，左下角竖着写了“克己复礼，万世师表”八个铅笔字，是父亲的笔迹。翻过来是一段介绍孔子生平的短文。然后是孟子像，八个字是“舍生取义，信善性善”。屈原“忠而见逐，情何以堪”，司马迁“成一家言，重于泰山”，嵇康“内不愧心，外不负俗”，陶渊明“富贵烟云，采菊亦乐”，李白“笑傲王侯，空怀壮气”，杜甫“耿耿星河，天下千秋”，苏东坡“君子之风，流泽万古”，文天祥“虽死何惧，丹心汗青”，曹雪芹“圣哉忍者，踏雪无痕”，谭嗣同“肩承社稷，肝胆昆仑”，一共十二人。我翻看着这些画像，血一股一股地往头上涌，浑身筛糠般地颤抖。那种朦胧而强烈的感情冲击着我，我自己也无法给予确切的说明。我准备把书合上的时候，发现最后一页还夹着一张纸，抽出来是一个年轻的现代人的肖像，眉头微蹙，目光平和，嘴唇紧闭。有一行签名，已经很模糊了，我仔细辨认才看出来：池永昶自画像，一九五七年八月八日。下面是一横排钢笔字：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这是父亲的像啊，二十年了！一口一口地我喘着粗气，声音在夜中被放大了，像门外传进来的。山风呜呜地响着，天亮了。

2.

十年前，父亲带着我来到这个名叫三山坳的山村，那是一九六七年，我十岁。父亲在我出生那年被划为右派分子，虽然在六二年摘帽了，但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还是被赶出了县中医院。十年来，他就这一带行医，活人无数。三天前，他突然倒了下去，就再也没有起来。

当时我正打算进山去采草药，刚走出村，就听见有人喊：“大为崽呀，你爸爸摔倒了！”我甩下竹篓就往回跑，到家门时看见父亲躺在地上，村民们

都围着他不知所措。我跑过去掐着他的人中,没有反应,就哭了起来。秦三爹说:“送卫生院!”马上有人抬来一张竹躺椅,两根楠竹扎起来成了一副担架。马二虎秦四毛抬着就走,几个年轻人跟在后面准备接替。我跌跌撞撞跟在后面,路上摔了几个跟头,下巴都摔出了血,也没有一点感觉。走到半路,父亲的身体老是往下滑,秦三爹把裤腰带解下来想把父亲的身子绑在竹躺椅上,正绑着他的手停了下来,眼睛望着我。我惊恐地问:“怎么了?”秦三爹把父亲的手抓起来说:“大为崽,开始冷了。”

医生说父亲死于脑溢血,我根本没有听说过他有这种病,我不相信,可人已经凉了。我在父亲全身上下摸着,把手插到身子下面去摸背脊,想找到一处温热的地方,又把衣服掀开来,脸贴在胸前细听,凉意传了过来,越来越明显,最后我绝望了。父亲抬回三山坳的时候,全村的人都来了,接着邻近的村庄也来了很多人。秦三爹说:“池爹他有后人,还是按老规矩办吧。”马七爹把自己的寿材抬来了,他拍着胸脯说:“我这把骨头,还可以熬个三年五年的吧。”我给他磕了头,马七爹说:“我受了你磕的这个头,棺材我就送给池爹了,他人真的好呢!”父亲在世的时候经常说:“做个好人真的合算,是最合算的。”他的话我懂了,却又不大懂。我还不能充分想象,自己吃了亏,还有什么合算。现在我似乎懂得了,做一个好人真的合算啊!

竹棚扎了起来,这就是灵堂了。我跪在那里烧了九斤三两纸钱,把灰用布袋装了,给父亲做枕头。守夜的那天晚上,马二虎下山请来了响器班,买了两只花圈,还有鞭炮和冥币。晚餐开了五桌烂肉饭,有身份的人入席坐了,其他人自己拿只碗,在饭甑里舀一碗饭,加一瓢汤,再夹一撮剁辣椒,也算吃了一餐丧饭。九点钟一到,响器敲了起来。唱夜歌的拿着调儿唱道:“孝子磕头!”我还没反应过来,马七爹一捅我的腰,我就在灵柩前跪下了。响器停下来,放了一挂鞭炮,唢呐又吹起来。我平生没有听过如此凄凉悲婉的曲子,像天上飘来的声音,那调子都吹到心里去了。灵棚旁边生了六堆大火,烟弥散着,火光映着人的脸,在唢呐声中给人一种非人间的感觉。

第二天清晨出殡,他们把赶制出来的寿衣给父亲换上,按照父亲生前的交待,用一块白布把他的身子裹了起来。几个小伙子把我从灵柩边架开,我远远看见他们换了寿衣,裹上白布,把许多生石灰塞进去,再把白布一层层盖上。一切准备好了,又架着我过去见最后一面。我看见父亲躺在那里,只露出一张脸,像睡着了一样。我想到这就是永别了,哭得气绝。唱夜歌的庄严地喊道:“时辰到!”鞭炮响了起来。两个年轻人把棺材盖上,马七爹走上去长揖三次,拿着竹钉钉了起来。我挣扎着要扑上去,秦三爹说:“按规矩办!”两个年轻人把我死死地架住,按在地上跪着。杠头唱了声:“咦哟嘴,

起！”十六个人就把棺材抬了起来。主杆的前面站着一只翅膀被扎起来的雄鸡，后面是一只巨大的银色纸鹤。我端着遗像在前面走着，每一次换杆我都转过身来给抬杠的人磕头。唢呐在山间小路上凄婉地响着，唢呐一停，鼓和钹就响了起来，回声从四周的山上荡了过来。

到了坟场，坑已经挖好，秦三爹把雄鸡一把抓下来，宰了，倒提着，把血淋到坑底。两根粗大的绳索吊起棺材，缓缓地放了下去。我跪在坑边，头伏了下去。我闻到了泥土的气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气息，有着涩涩的腥味。我看着父亲无可挽回地离我远去。

父亲下葬后第二天，秦四毛来找我：“这里有封信是你的。那天我碰到乡邮员，他要我把信带给你。我把信给了池爹，他看了以后就倒下了。我这几天只记得忙，信塞在口袋里都忘记了。”我接过信一看，是我的人学通知书，北京中医学院，我考上了！可是，父亲却因此离开了我。

当时父亲接了信，盯着信封看了好一会儿，嘴里说：“可能是的，可能是的，等大为崽回来再拆。”可还是忍不住拆了。他看了信，便仰面哈哈大笑起来，一只手举了上去，吼了一句：“苍天有眼，公正在时间的路口等待！”就一头栽在地上，再没有起来。

我完全明白为什么那份通知书会给父亲那样巨大的震撼。

我出生那年父亲被划为右派。其实他并不热心于政治，在鸣放中也没说什么。他的同事朱道夫在整风会上给县中医院的吴书记提了三条意见，吴书记当时很虚心地接受了。可一个星期以后风云突变，那三条意见成了向党进攻的罪状。朱道夫大感意外，声泪俱下地表白自己对组织的赤胆忠心，而且，公布的罪状与他当时的发言相去实在太远。他哀求那天参加会议的人出来作证，可大家都沉默了。一天晚上朱道夫来找父亲，一进门就跪在地上，请父亲出来说句公道话。父亲没有迟疑就答应了，在他看来，这不过是维护自己做人的起码原则，他并没有足够想象力去设想站出来陈述一个事实意味着什么。朱道夫当时拉着父亲的手连声说：“好人，好人啊！”可父亲的证词毫无意义。吴书记笑着问他：“是这样的吗？你再想想？”父亲认真地点点头说：“我以人格担保。”书记又笑了说：“你的人格就那么值钱？”又一只手在父亲眼前一点一点地说：“再好好想想，仔细想一想。”父亲被激怒了说：“才多久的事我会记错？一个人他做人总要实事求是。”吴书记反问：“那你的意思是组织上没实事求是？”

我就是在那一年出生的。父亲怎么也想不到，那几分钟的对话，要以几代人的牺牲作为代价。一九六一年，爷爷又气又病还吃不上饭，饿死了。我从小就生长在歧视的眼光之中，六一年我四岁，整天饿着向大人要吃的。后

来父亲告诉我,那一年大人都得了水肿,而我常常是坐在门坎上碗不离嘴就把一碗饭吃下去了。“文革”来了,父亲挨了斗,戴着尖尖的纸帽,敲着一面铜锣游街。那时我在读三年级,我迷惑了。难道父亲不是好人吗?好人怎么会被游斗呢?不是好人他怎么常常告诉我我要做个好人?那时我心中装满了“黑帮”和“潜伏特务”一类的词,真不敢把这些词与父亲联系起来。同学们一唱“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的歌,我就恨不得找一道地缝钻进去。后来人们就忘了他,抓“活老虎”“走资派”去了。那时朱道夫常到我家来和父亲说话,两人同病相怜。一九六七年底,《人民日报》登出了文章,“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这时朱道夫突然站出来揭发了父亲,说父亲讲了怎样的反动言论,而自己讲的那些话,不过是为了引蛇出洞,让池水永充分暴露活思想。这样父亲就下放到深山之中的小村三山坳来了。而母亲,她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带着五岁的妹妹离开了。朱道夫因为揭发有功,就留在县城了。没有人比我们更懂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几个字的沉重分量。我读了初中,尽管成绩优秀,仍不能升高中,回到山里成了一名社员。而父亲他倒是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成为了远近闻名的乡间医生。

我的命运似乎已经确定。父亲开始教我探脉、采药、配方。我崇敬他,但内心却强烈地反抗着这样的命运。就这样过了五年,我也是一个乡间医生了,我认了命,不再敢奢望命运会有任何转机。从我懂事以来,父亲从来没有打骂过我。唯有一次,我在绝望中轻声抱怨了几句,怨父亲不该为朱道夫那个猪都不如的东西说话。万没想到父亲突然发了脾气,身子簌簌抖着,一根手指头一点一点地指着我,说:“崽子,你还没有学会做人,做人!”看着父亲身子颤抖,我很后悔,自己戳到他视为神圣不容亵渎的东西了。当时父亲说:“我一辈子什么都没有,就图了个清白。我死后用白布把我裹起来,你别忘了。”开始有人给我提亲了,我竭力地推辞着,却感到了巨大的阴影正在一步步无可阻挡地逼近。我绝望了。

这天,初中同学胡一兵和刘跃进来到了三山坳,告诉我一个惊人的消息,中国的大学要开考了。我说:“高中都不让我读,还让我读大学?”他们互相望一眼,都不做声。他们走后我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那一天父亲整夜没睡,垂着头在灯下一支接一支抽烟。我装着睡着了,咬着被子,眼泪把枕头濡湿了很大一块。清早父亲对我说:“我下山走一趟。”就进城去了。晚上回来,喘着说:“你可以考,我问了,你可以考!”边说边把拳头对着土墙用力打去,皮都破了,血渗了出来。我豁出命来读了三个月的书,在十一月份参加了全省统考。从那以后父亲每天就坐在门坎上,望着乡邮员走上来的那条小路。虽然要一个星期才送一次信,他还是每天那么望着。消息传来,

刘跃进和胡一兵都拿到通知书了，一个到武汉大学去学哲学，一个到复旦大学学新闻。我简直没有勇气面对父亲那若有所思的眼光，垂了头恨不得夹到胯里去。父亲说：“就算没考上，那还能怪你吗？也可能是他们讲政治条件。”我心里想：“没考上明年还可以考，要讲政治条件我这一辈子就吹灯拔蜡了。”我强烈希望是自己没考好，那样明年还有希望。没想到录取通知书最后还是来了，更想不到父亲就那么去了。

去北京之前我到了坟地，在父亲的墓前跪下了。中午的阳光带着一丝暖意照在我身上，风吹起了衰草，也吹起了我的头发。不知名的鸟儿在看不见的地方歌唱。一只鹰在天上孤独地盘旋，盘旋，突然，箭一般地扎到山崖中去了。坟拱起来是一个锥形的小土堆，泥土的气息还没有散去。父亲已经死了，我还活着。我心里似乎在恨着，却不知恨谁。我拈起一撮土，放在嘴里慢慢地咀嚼，吞了下去。群山起伏，静卧在阳光之下。对它们来说，一年，十年，一百年，时间并不存在。北风呜呜地吹着，像天边传来的召唤。

3.

刚进大学的时候，我对父亲的一生进行了长时间的思考。我为父亲感到委屈，那么好的一个人，又那么有才华，却那么凄凉地过了一生。“做个好人”，鼻子下面那张嘴吐一口气就说出来了，可做起来容易吗？还有，父亲他值得吗？那个朱道夫回过头来还咬了他一口呢。

不过我到底还是没有把这些问题放在心中反复纠缠。在那些岁月里我心中充满了放眼天下的激情，无论如何都不能满足于那种把日子当做日子，把自己当做终极的生活，也不能设想把视野局限于以自我为中心以私利为半径的那个小小圆圈之中。那种庸人哲学轻如鸿毛，我觉得实在很可笑，也实在是不屑一顾。别人愿意用世俗的方式体验世界，那是他的可怜选择，我决不会走上那条路的。似乎有一种神秘的声音，从灵魂深处生长出来的声音提醒着我，我注定是要为天下，而不只是为自己活着的，这是我的宿命，我别无选择。我在内心把那些将物质的享受和占有当做人生最高目标的人称为“猪人”，在精神上与他们划出了明确的界线，并因此感到了心灵上的优越。人应该追求意义，意义比生活更重要，不然怎么还叫做人呢？那时候农村改革刚刚兴起，暑假里我和胡一兵刘跃进一起，每人背上一个挎包，到丘山全县的各个乡去搞调查，找各种各样的人了解情况，把农民们说的话都用小本子记下来。晚上，就睡在草丛里，蚊子多得要命，就轮着摇扇子，把白天

了解的情况做出种种分析,得出宏伟的结论。睡在青草中仰望无边的星空,真有临环宇而小天下的豪迈气概。为了一个问题我们可以争上大半夜,似乎结论有关民族前途人类命运。漂流了二十多天,我们到了刘跃进家,关上门忙了几天,写出了一份调查报告,三万多字,寄到国务院去了。虽然如石沉大海,但几个人还是觉得办了一件大事。

在大学四年级的那一年,一九八一年,一个春天的夜晚,我从图书馆回到宿舍,活动室的黑白电视正在放足球比赛,人声鼎沸。我平时很少看球,这天被同学们的情绪感染了,也搬了凳子站在后面看。那是中国与沙特队的比赛,中国队在二比〇落后的情况下,竟以三比二反败为胜。比赛一结束,大家都激动得要发疯。宿舍外有人在呐喊,大家一窝蜂就拥下去了。有人在黑暗中站在凳子上演讲,又有人把扫帚点燃了举起来当做火把。这时,楼上吹起了小号,无数的人跟着小号唱了起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火光照着人们的脸,人人的脸上都闪着泪花,接着同学们手挽着手,八个人一排,自发地组成了游行队伍。走在队伍中,我心中充满了神圣的感情,哪怕要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我忽然想起了文天祥,还有谭嗣同,那一瞬间我入骨入髓地理解了他们。挽着我左手的一个女同学哭出声来,我借着火把的微光望过去,原来是班上的许小曼。前面有人喊起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这口号马上就变成了那一夜的主题,响彻校园上空。那一天是三月二十日,北京几乎所有的大学都举行了校园游行。“三二〇之夜”使我好几天都处于亢奋的状态,我觉得自己的灵魂受到了圣洁的洗礼,也极大地激发了我的责任意识。我坚定了信念,它像日出东方一样无可怀疑,无可移易。

游行后有一天我在操场边碰到许小曼,我点点头与她擦身而过。走过去后她叫我:“池大为。”我乖乖地站住了,转过身去。她站着不动,也不做声,笑着。我怔了一会儿说:“有什么事吗,许小曼?”她说:“谁规定了有事情才能叫你?”我站在那里很不自在,说:“那,那……”话没说完,她头那么轻轻一点,似乎是叫我过去。我怕自己领会错了,仍站着。她手抬起来,食指轻轻勾了一下,我像接到了命令,挪步走了过去。她说:“前天药理分析我缺课了,要抄你的笔记,拿来。”我从书包里把笔记本拿出来。她接过去,也不说什么,仍望着我,笑着。我心中发慌,说:“还要什么,许小曼?”她仍然望着我,说:“不要什么。”我躲着她的眼光,盯着她的脚。她轻轻一笑说:“池大为。”我猛地抬头说:“什么事,许小曼?”她抿嘴一笑说:“没什么事。”我站着不动,额头上的汗都出来了,抬手用衣袖擦了一下。她哧的一笑,手很优雅地一扬说:“没什么事,你去吧。”过几天上课时,她当着同学们的面

把笔记本还给我，旁边的男同学都感到惊奇，直对我挤眼睛。我看见笔记本的封皮已经包好，里面破损的地方也都用透明胶带粘上了。我心中大为感动，却不敢往深处想。许小曼是我这样的人消受得了的吗？她的漂亮在我们系里甚至全校都是出了名的，寝室里的男同学经常站在楼上窗口，看她打了饭从楼下经过回宿舍去。有一次我看见她在食堂里喝粥，外系一个男同学坐到她身边想搭话，她把勺往碗里一扔，“当”的一响，端着就走。何况她是北京人，父亲又是军级干部。传说班上有八个同学想追求她，被称为“八老”。这样的女孩我从来视若天人敬而远之，想都没想过自己能与她有什么特殊的交往。上大学三年多来，我很少跟女同学说话，更不用说跟许小曼了。我并没有小看自己，内心甚至还很骄傲，我尽量把这点骄傲从学习上特别是考试中表现出来。同时我又很现实地看自己，我凭每月二十一块钱的助学金生活，衣服也没有一件潇洒的，书包还是帆布的军用书包。校园里还有几个人用这种老式书包？以前寝室里几个同学在争论许小曼的挎包是仿皮还是真皮的，面红耳赤几乎要吵架，最后的考察的结论是真皮的，还是澳大利亚进口的小牛皮。就凭这点差别，我根本没有想过自己会跟许小曼有什么特殊的来往。不是自己的东西，想它干吗？我心如止水，也就不必像“八老”等人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因此我感动过后，只觉得许小曼是个好女孩，别的也没去想了。

一天晚上我去教室自习，刚坐下许小曼就进来了，凑到我跟前说：“池大为你也在这里啊。”她坐在我后面几排。看着书我总觉得后脑勺麻酥酥的，几次想扭头看看，都忍住了。书看得越来越含糊，心神都转到了后面那个人身上。一会儿许小曼过来问我一个问题，不幸我说得语无伦次含糊不清。她走了我十分遗憾，几年才等到这么一个表现的机会，反而丢脸了。她会不会在心中小看了我？我真希望她再给我一次机会。就好像有心灵感应似的，正想着她又过来了，这一次我讲得有有条有理。她头发中散发出一种奇异的芳香，我忍不住装着要讲得更详细些，把头靠近了用力地吸了几下。这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心神不定，那种淡淡的芳香总是在我身边缭绕。

第二天晚上我又到那间教室去，模糊地希望再见到许小曼。到了九点多钟她还没来，我心神不定，又说服自己说：“几年才碰到一次，还有第二次吗？”渐渐地我反而安心了，想入非非，那可能吗？正想着她进来了，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使劲眨一眨眼，可不就是她。她笑一笑，我点点头，又低下头装作用心看书。她在我的左前方坐下，掏出笔来写着什么。我的头不听使唤似的，老忍不住微微偏了斜着眼去瞟她的侧影，鼻子、耳朵、头发，无一不是恰到好处。看见她头一动，我马上就把头转向书本。这样好几次，我

看着看着忘了情，她突然一转头，我似乎不记得应该掩饰，仍是那么微张着嘴呆呆望着。她眼睛询问似的一眨，我才意识到自己失态了，把眼睛转到书上，书上写了什么，却是一个字也看不进去了。再往后我就不敢去那间教室了，许小曼是谁，池大为又是谁，那可能吗？能那么近距离地看一看就已经很奢侈了，还真能一厢情愿？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在这方面作超水平的发挥，那不可能，也不符合我的性格。

这天在图书馆与许小曼迎面相逢，她把我叫住说：“池大为，你最近怎么老躲着我？”这话没头没脑大有意味，可我还是不敢充分展开自己的想象，给予准确的解释。我跟她说话，眼睛不住地往两边瞟，怕同学看见了把我列为“老九”。她说：“池大为你的眼睛怎么老是鬼鬼祟祟的？”我只好把“八老”之说讲了。她说：“有这样的事？那现在放你走，明天晚上，老地方。”不等回答就走了。

第二天我不敢不去，在那间教室等了很久，许小曼也没来。我心痒难熬，跑到楼下去，又跑上来，上窜下跳十几个来回，一直到打熄灯铃了，才泄了气。我太自作多情，人家顺口说句话，我就当了真。心中又怨着她，你没那意思我也不敢有什么妄想，偏要惹我，害我乱了方寸，这一乱不知何时才能平息。第二天上课仍不见许小曼的身影，我想问女同学，又不敢问。晚饭前在寝室听见汪贵发和伍巍议论，说许小曼因急伤风引起胃痉挛，在校医院住院，他们已经去看过了。我心中直跳，装着若无其事，出了门马上往医院跑，在病房门口看见有几个男同学围在病床前，就退了出来。我在窗外来来回回地走，总想找到一个机会，单独地看一看她。可不断有人来往，一呆就是半个多小时一个小时。天黑之后又来了一个男的，高高大大，在她的床前坐了很久，恨得我心中痒痒的。本来还想就这么进去，看同学嘛！到后来越发失去了勇气，人家有人看有人守，我是谁？回到寝室想找另一个同学一起去，可没有勇气开口，好像一开口别人就会知道我想什么。又回到医院，那人还没走。一直到医院关门，看那男的出来，我在他后面跟了一段才回寝室。

第二天上午我没去上课，一打铃就直奔校医院，老天保佑，她床前没人。许小曼很兴奋，说：“大为你怎么早不来看我？”我说：“反正你有人看。”她说：“我一直在等你。”我说：“昨天晚上我来了，这里一直有人，有人守到关门，我就没进来。”她笑了说：“傻哥哥呢，那是别人，不管他。人家要来，我总不能叫他走，那是别人。”我们说着话，她眼睛里的那点东西似乎是很明确，又不太明确，我不敢确定。说着话她一只手从毯子下缓缓伸过来，似乎不经意地，触到了我搁在床边的那只手，停下。我没有动，她冰冷的手指摸索上来，

在我的手背上轻轻握了一下，又慢慢摸上去，在我的手腕上来回抚摸，最后把我的右手握住，攥紧，渐渐攥热了，说：“你好。”眼睛也闪着一种奇异的光，像是一种能量在瞬间被点燃了。我感动得直想哭，说：“是真的吗？不可能，真的不可能啊！”她说：“谁说不是真的，不可能？”把我的手握得更紧，手心传过来一种湿热，一种渴念。我全部的感觉都集中到那只手上，感到手心一下又一下有着节奏均匀的微颤，像有一颗小小的心脏在那里跳动。

正在这幸福的时刻，她妈妈来了，要接她回去。我叫了一声“阿姨”，她点点头，不说什么。看着她妈妈在收拾东西，我呆在那里，手脚都成了多余的东西。她妈妈扶起她的时候，我想上去帮一把，手往前一伸又缩了回来。许小曼说：“池大为你拿东西。”我心里一热，把网兜提在手中。这时进来了一个军人，她妈妈说：“小李把东西提到车里去。”我就乖乖地把网兜递了过去。小李把车发动起来，我呆站在那里。许小曼说：“大为我很快就会好的。”我刚把手扬上去，车就开了。回到寝室，我把右手放到鼻子前闻了闻，又闻了闻，犹豫着，在脸颊上摸了摸，脸上一阵发烧，羞怯地偷笑了一声，又犹豫着，揭开衣服，把浑身上下都摸了一遍。

4.

这样我跟许小曼就明确了那点意思。不可思议的事情竟然就这样发生了，我幸福地觉得世界是一个虚构。我不放心，总是问她怎么会喜欢了我，还有那么多优秀青年呢。她说：“他们太聪明了，看上去那么浮着，轻飘飘的。”我还不放心，再问几次，她说：“喜欢就是喜欢吧，爱就是爱吧，为什么一定要问那么多为什么？”又说：“我就那么不会看人？杜聿明的女儿，那么多公子哥儿围着转，她都看不上，偏看上了布衣子弟杨振宁，怎么样？那才是眼光呢。”她这么一说我感到惭愧，我哪能有那么大的出息？我沉醉了好些日子，捧在手里都怕手心那点热气把她融化了。跟许小曼的交往大大地激发了我的奋斗精神，我不做出点事来怎么对得起她？我真觉得她样样都好，连生气都让人爱。在一个台湾作家写的书上看到，他声称自己的妻子是“亚洲最漂亮的女人”，我觉得简直是胡说八道，真恨不得一拳把他打到墙上变幅画。想来想去还是原谅了他，他没到北京中医学院来过，也没见到过许小曼啊。

因为许小曼，我得罪了那几个同学，他们把我看作情敌。伍巍说：“大为你爆冷门了，你有时考试爆冷门，没想到别的方面也爆冷门。”我老实说：

“我自己也没想到。”又恨自己不争气，他这么说，我怎么不反击？马上又说：“难道谁规定了谁一定是属于谁的？”汪贵发在一边说：“没想到他倒吃着天鹅肉了。”这个汪贵发，前几年经常耍我。有一次我从外面回寝室，几个人围着一副哑铃在说什么。汪贵发说：“池大为，刚才我们几个人举哑铃，看谁能双手举两只坚持十分钟，没有一个人能坚持下来，你敢试试？”我说：“这算什么！”举了有五分钟，汪贵发一本正经看着表说：“快了，快了。”另外几个人开始发笑，渐渐笑得前仰后合。我这才知道上当了，硬是咬着牙坚持了十分钟。伍巍说：“我肚子眼都笑疼了。”现在汪贵发竟又这么说我，我憋了一会儿，冲口而出说：“你才是癞蛤蟆呢！”他马上跳起来说：“池大为你骂人干什么，我说你了吗？”我说：“那难道我说了你？”两人吵了起来，被伍巍拉开了。

跟许小曼交往久了，我感到她被家里惯坏了，也被男孩子们惯坏了，她的愿望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以讨论的绝对命令。开始我还忍着，为了她别说忍这么一时，忍一辈子也是应该的。可日子久了也难免发生一些小冲突，她就像受了天大的委屈，眼泪直流。这时候我就要把男性的倔犟强压下去，陪着笑作出深刻检讨。我能够忍受她的任性，可是任性后面的那点意味，那点居高临下和恩赐的意味，却是我绝对接受不了的。更令我难以接受的，是她那种等级观念，她认为人天生就分为了上等人 and 下等人，连血液和脑垂体都不同，这是遗传基因决定的，因此不可能改变。而我的观念完全是平民化的，我看那些山民的孩子并不比谁傻些，只是没有一种适合的环境。我说：“我就是山坳里出来的，那我也是下等人。”她说：“你不是，不然怎么你没读高中也考出来了，别人就出不来？你爸爸也是读了大学的。那种不同在血液里骨头里脑髓里。”我们辩论了好多次，我总无法说服她。后来她带我去她家，知道她是在怎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这是我在北京见过的最好的房子，五室两厅，要转几个圈才能够把房子的结构弄明白，比起来学校那些教授的房子就太寒酸了。连许小曼自己，也拥有一套一室一厅的房中之房。我刚坐下，就有保姆倒了茶，摆上了点心，不一会儿又是勤务兵送来了开水，把垃圾提了下去。我坐在那里目瞪口呆，感到了强烈的震撼，人跟人这距离真远过天地之遥啊。快到中午她妈妈回来了，举手投足之间都有着一种高贵的气质，把提包放下来的动作特别优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坐在那里感到了很大的压力，许小曼说：“这就是池大为，我跟你讲过的，妈。”我被她妈妈镇住了，她问我很多话，我回答得语无伦次。硬着头皮吃完了饭，回到许小曼的房间，我才松了口气。许小曼说：“以后这就是我们的爱情小巢了。”我心想：“那我还不如住到贫民窟去呢。”

交往了几个月,我发现许小曼把我想错了。她觉得自己的愿望对我来说都是圣旨,因为她是许小曼,我只是池大为。我压抑了自己去迎合她,反抗的冲动却越来越强烈。有些事情,我心中明白要怎么做才会让她高兴,可事到临头心里就别扭着,怎么也做不出来。她的目标是要把我培养成一个上等人,有上流社会的风度和情感方式。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正如我也没有力量把平民意识灌输到她大脑中去。我不能没有止境地扭曲自己,哪怕是为了许小曼也不行。父亲的血流淌在我的血管之中,形成了既定的体验方式。遗传密码作为一种神秘的信号,其选择方向是那样固执,它无可更改地决定了我。

应该让许小曼知道真实的我,我池大为虽然穷,虽然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但并不是没有自己的意志的。许小曼要带我去交结一些“有层次”的朋友,我陪她去了几次,觉得格格不入。那些人的优越感,我感到非常可笑,他们自己却十分认真。特别是有一次,许小曼向别人介绍说,我父亲是省城著名的中医,医学院的教授。我别扭得不行,也只好点点头。事后我生气说:“我什么时候跟你这么说过!”她说:“那些人都是很讲究的,如果连教授都不是,他们会有想法。”我说:“管他怎么想呢,他算老几?”她说:“你怕什么,他们又不会去调查。你也理解理解我。”也许,我是得理解理解她,她按照自己的观念与人交往,她爱面子。可她说顺了口,对谁都这么说,我生气也没有用,她不在意,说:“大为你别太认真,也让我对朋友有个交待。”我说:“你这是把我放在火上烤,我站在那里都想钻地缝了。”两人争了一会儿,我还是退了下来。她是许小曼,我不能跟她生气,我只能憋着自己。

渐渐地我对许小曼的感觉有些变了,我相信她也是如此。这是一种危险的征兆,我必须悬崖勒马。可我扭着自己,扭得了一时还扭得了一世吗?我在她面前太被动了,我原想通过自己的奋斗扭转局面,可这奋斗一时半会儿无法见效。我想,女人是给人爱怜的,没有那点怜惜,那爱就没有根底,就像女人涂胭脂不打底粉,托不住。

我决心对许小曼的任性进行抵抗。如果连我都认为自己是欠了她的而放弃了自我立场,那以后还有个完?这天她要我陪她去人艺看话剧《明月初照人》,我说要做实验,已经安排好了。她再三要求,我都没松口,这使她大感意外。争执之间她说:“你今天不去就是心里没有我,那还有什么意思?”我还赔了笑脸解释,她打断说:“到底去不去?一二三。”我咬了牙说:“不去。”她说:“你好好想一想,仔细想一想。”我不假思索地说:“想好了。”她说:“你爱我还是没有爱到骨头里面去。”又说:“我总找得到一个人陪我去吧。”扭头就走。事后我希望她来找我,她没有来。我犹豫着是不是该去

找她，向她认错。可又想，这么一认错，我一辈子就错到底了。在极度的痛苦中，经过了许多辗转反侧之夜，我意识到许小曼并不是属于我的，也许她现在也从浪漫而伟大的牺牲激情中省悟过来。毕竟，我们的血管里流着的是不同的血。事情就这么过去了，汪贵发等人模糊而明确地说着刻毒的话，我都装着听不懂，忍了，忍了。父亲当年不也是这么忍过来的？我还是感到了一点轻松，一点安慰，平民也可以坚守自己心灵的高贵。

毕业后，许小曼去了卫生部，我把铺盖一卷搬到研究生楼，开始了新的学生生活。

那三年我在研读古代医典的同时，把很多文化名人的书也找来看了。在阅读中我发现了一个事实，那些大人物，从屈原到曹雪芹，没有几个不是命运凄凉一生潦倒的。我特别把父亲那本《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上的人的生平都找来看了，真的为他们感到委屈。好些夜里我把那本书翻开，在久久的凝视中理解了那些人物，也理解了父亲把心灵的原则当做绝对命令，要付出怎样沉重的代价，可这才是真正的人啊。

三年很快就过去了。这期间许小曼来过一次，告诉我她已经结婚了。她反复对我说一定要写入党申请书，我就写了，很顺利地入了党。一天，系里的人事干事找了我，问我愿不愿留校。我说愿意，我心里早作了这种准备，在药理专业的四个研究生中，我发表的论文是最多的。过了几天他碰见我，把我拉到路边说：“有人看上你了。”他说的是系里姜教授的女儿，我见过一次，印象挺不错的。我心里觉得可以试试，又不好意思就表态。他见我迟疑着，又说：“这件事对你各方面都有帮助。”我以为他说的是学术上，说：“我又不是那个专业的。”他说：“学术是一方面，还有个人发展，在北京发展啊。”我知道姜教授说话的分量，我的导师那么神气，也要让他几分。可把这件事跟留校联系起来，我很难接受，那样我不成了投机分子？我说：“让我想想。”他很感意外，说：“尽快给我一个答复。”又暧昧地说：“毕业的安排也就在这几天了。”

回到宿舍我想来想去，决定即使要跟那姑娘试一试感觉如何，也得等毕业了再说。还没开始就欠下一个人情，那怎么行？我没去找人事干事。他遇见我，询问地望我一眼，我模糊地笑一笑，他就再没表情了。半个月后，消息传出来，留下来的是我的一个同学。我感到委屈，可跟谁去说，又怎么说？我体会到哑巴吃黄连的滋味。原则千条万条，利害关系是第一条。实质性问题，都是在这种微妙之处决定的。我的导师问我愿不愿去药检局，我说：“我回省里去。”到底我在北京呆了八年，还是呆出了感情。我安慰自己说：“北京有什么好？最大的好处就是难得进来。”又想着自己如果玩点小聪

明,先应了人事干事,以后该怎么样还怎么样,岂不就没了这场委屈?可如果那样,我池大为还是池大为吗?

在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晚上,我心中感到郁闷,就到街上走一走,最后看一看北京。数日来的彻夜静思,使我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尽管现实中有很多不动声色的力量笼罩着我,推动着我,似乎无可抗拒,我还是要走自己认定的道路,哪怕孤独,哪怕冷落,因为,我是一个知识分子。

夏日的夜晚,我在街头漫步。凌晨三点,我翻过围墙,回到了宿舍。